

# 中韩日管理方式比较与 半岛制造业建设战略

高光锐 孟庆义 王倩等著



吉林大学出版社

# **中韩日管理方式比较 与半岛制造业建设战略**

**高光锐 孟庆义 王 倩**

**任俊义 徐世腾 孙立人**

**吉林大学出版社**

---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韩日管理方式比较与半岛制造业建设战略/高光锐, 孟庆义, 王倩等著. —长春: 吉林大学出版社, 2006. 2

ISBN 7-5601-3351-7

I. 中... II. ①高... ②孟... ③王... III. 制造工业—工业企业管理—对比研究—中国、韩国、日本②制造工业—经济发展—研究—山东半岛

IV. F426. 4②F431. 206. 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08775 号

---

书名：中韩日管理方式比较与半岛制造业建设战略

作者：高光锐 孟庆义 王倩 任俊义 徐世腾 孙立人

---

责任编辑、责任校对：张显吉

封面设计：李程

---

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

(长春市明德路 421 号)

吉林大学出版社发行

吉林九三彩色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2006 年 2 月第 1 版

印张：9.625 插页：10

2006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250 千字

印数：1—1000 册

---

ISBN 7-5601-3351-7

定价：18.00 元

## 序 言

本书在具体地研究韩国、日本企业管理思想及方法，以及中国文化对两国管理思想的影响，日本、韩国企业管理方式方法与目前我国企业管理思想的相溶性，这些思想与方法在山东半岛合资企业中的新发展及其对半岛制造业基地建设的深远影响、应用复杂网络理论研究半岛制造业建设等有所创新。

在我省尤其是山东半岛，与日韩合资及日韩的独资企业很多，这些企业在解决我省就业，调整产业结构和发展我省的对外贸易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怎样使这种状态健康地持续下去并实现山东半岛制造业基地发展战略，是一个重要的课题。这需要我们对中韩日合资企业和日韩独资企业进行详尽深入的研究，尤其是对其管理思想、方式方法进行必要的对比，找出共性，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形成能为我国及东亚其它国家所用的管理理论和方法，从而在良好合作的基础上，使这些企业能够继续为我国的经济发展做出贡献。在我省的经济发展过程中，与日本、韩国的合作潜力很大，双方不但在许多方面是互补的，而且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是相互需求的，尤其是在打造山东半岛

制造业的过程中这种迹象更加明显。

目前，韩国、日本与我国合资及两国在我国设立的独资企业较多，投资已经占了总量的首位。由于地理优势，山东半岛与韩国、日本的企业合作又居全国的首位，尤其与韩国的合作一直名列前茅。在建立“大而强、富而美的新山东”，“打造山东半岛制造业基地”中，这种合作势头将更加旺盛。对其及时的研究与总结，无论对山东半岛制造业基地的建设，还是对企业的自身管理水平以及管理理论水平的提高和创新都是具有重大意义的。

该成果为山东省社科规划重点项目“中韩日管理方式比较与半岛制造业建设研究 04BJZ45”的研究成果，感谢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的支持。研究过程中得到吉林大学管理学院蔡莉教授、浙江大学管理学院马庆国教授、上海理工大学李好好教授、上海交通大学管理学院吴迪教授、大连大学经管学院张相斌教授、浙江财经学院张荣教授的帮助，在此再次真诚感谢！

高光锐

2005.12

# 目 录

日韩现代管理思想中的儒家文化因素	孟庆义 刘会清
一、儒家文化对东亚主要国家的影响与作用	3
二、中日韩管理方式的文化基础分析	8
三、中日韩管理中的儒家理论基础研究	14
中韩日企业制度比较	王 倩
一、概述：现代企业制度的涵义与特征	25
二、中韩日企业的特点与国有企业改革	28
三、中日韩三国公司治理方式的比较	44
中日韩企业营销理念及模式比较研究	徐世腾
一、中日韩企业营销理念比较	87
二、中日韩企业营销模式比较	95

## 中日韩企业 JIT/AM 生产模式比较分析

任俊义

一、JIT 与 AM-----	108
二、日韩企业 JIT/AM 生产模式-----	110
三、我国制造业现状及生产模式-----	114
四、中、日韩企业 JIT/AM 生产模式比较-----	120
五、启示-----	123

## 中日韩企业合作与山东半岛制造业基地建设

高光锐

一、目前山东半岛与日韩制造业合作形势-----	126
二、中日韩企业合作的成因及其发展趋势-----	132
三、日韩制造业转移战略-----	144
四、中国三大经济区制造业发展战略-----	152
五、半岛制造业与日韩企业合作的 SWOT 分析-----	161
六、制造业的发展战略复杂网络分析-----	200
七、基于中日韩合作的山东半岛制造业发展战略---	233

参考文献-----	265
-----------	-----

# 日韩现代管理思想中的儒家文化因素

孟庆义 刘会清

历史上的朝鲜、日本都从属于以中国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东亚封贡体系下，特别是自从唐、宋以来，这种天朝大国与藩属之间的封建关系表现的十分明显。

“这种国际秩序本身的扩大和缩小，不取决于周边各民族国家相互之间的对立和斗争，而是取决于中国封建王朝‘德化’力量的大小。它显示出的向外扩张的倾向，只是偶发性的现象，并不具有随着时代的进展而继续加速扩张的性质。”<sup>[1]</sup>由于中国统治者往往采取“厚往薄来”的政策，赐予朝贡的朝鲜、日本国的贵重礼物往往多于他们所贡纳的礼品，因此，日本、朝鲜乐于同中原王朝进行这种交易。在东亚封贡体系下，日本、韩国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借鉴与吸收是这两个国家走向现代化进程的一个突出特点，特别是他们现代管理思想的形成都与中国儒家思想息息相关。从地缘

政治的角度来看，在历史上朝鲜半岛和日本曾经臣服于亚洲大陆的中国政权，因此中国传统对这些地区的影响可以说是根本性的，甚至有些已经成为这两个民族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阿尔蒙德、鲍威尔曾经把政治社会化方式区分为直接方式和间接方式。直接的方式即明示的政治社会化，包括公开交流有关政治对象的信息、价值观或感情等；间接的方式即暗示的政治社会化，则指影响人们对政治体系中相应角色和对象的看法的非政治态度的传递。<sup>[2]</sup>由于在近代历史上日韩与中国都面临着类似的遭遇，所以在日韩儒家思想也一度遭到过质疑，但是随着东亚经济的崛起，东亚国家开始把目光从横向学习西方转向纵向对历史进行深邃思考，探询在全球化语境下如何保存自己国家的“原生态文化”，从管理层面进行分析，逐渐认识到儒家文化是他们开展现代化的思想源泉，特别是蕴含在儒家文化中的管理思想则成为他们进行企业、社会管理的“乳汁”。荷兰著名文化学专家霍夫斯坦特教授认为：“文化不是一种个体特征，而是具有相同的教育和生活经验的许多人所共有的心理程序。”所以相同

的地理环境、物质生活方式和社会组织形式形成了同一的文化。美国著名管理学家德鲁克指出“管理是以文化为转移的，并且受其社会的价值观、传统与习俗的支配”。

## 一、儒家文化对东亚主要国家的影响与作用

当今世界也正进入一个由工业化时代转入信息化时代的转型期，全球价值观念出现大失落、大混乱的状态，诚如联合国前秘书长德奎利亚尔而言：“发展决不能理解为仅仅限于物质享受方面的补充。”“我们现在的以不断扩大物质消费为主的发展方式，既不是行得通的，也不是可以无限延伸的，它们不仅在破坏文化的结构，而且还对生物圈构成了威胁，因而也就是对人类的生存构成了威胁。”<sup>[3]</sup>随着世界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经济全球化被看作是全球化最为明显的取向，而经济的全球化通常是以总产量的增长，生产率和资本投资的收益来衡量的。布热津斯基认为，经济全球化导致“几乎所有的既定价值标准，特别是在世界先进地区大规模地瓦解了”。世界因此已陷入了“全

面的精神危机”。随着东亚经济的崛起，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探索东亚崛起的秘密，几乎所有的学者都把东亚的现代化管理模式看成是东亚崛起的关键。特别是随着西方现代文化正在危害我们的精神健康。这使我们有足够的理由建立一整套新的价值标准和信仰体系。西方现代文化与西方社会所面临的其他严重问题之间的关系，使得这件事情显得更加迫切。因此以哈佛燕京学社社长的杜维明为代表的新儒学倡导，以人道、公正、文明修养、智慧和信任等价值观，并且把这些价值观通过举证范例、故事分享、宗教传道、道德教诲，特别是通过对话来传授，从而在社会上形成一股更具合理性的“和谐管理”模式，那就是人与人的和谐，要求个人把社会责任置于一己的私利之上。

德鲁克在《21世纪管理挑战》指出，将来的管理实际上越来越多的精力是花在人的管理上，他甚至提出80%的高级管理者都要把主要的精力放在处理人的问题上，他认为将来一个企业的管理和一个学校的管理、一个医院的管理，尽管管理的具体内容不同，但是它的根本点是相同的——那就是人的管理。日本的

丰田佐吉在创建丰田纺织公司时，他经营管理的座右铭是“天，地，人”三字，强调“和为贵”，即来自于孟子“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思想。其实这些都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吸收，所谓传统，是指祖宗创造的、在今天仍具有继承活性的文化。“真正的传统是已经积淀在人们的行为模式、思想方法、情感态度中的文化心理结构。”<sup>[4]</sup>

历史上，中国的传统文化对比起周边国家的文化而言曾是一种强势文化，所以也长时期博得他们“向风慕化”。自从近代以来，随着西方世界的崛起，中国文化却变成了一种弱势文化。随着人类迈向二十一世纪，今天世界的“力量平衡”已经发生变化，而且事实上出现了超国家、超国界的全球性力量和全球性的问题，人们关注更多的是超越民族国家界限以及符合人类终极关怀的全球性的要求。要想从根本上解决这一系列问题，这不是哪一个国家独立能够解决的，而建构和维持公平、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实际上是所有国家的任务，从根本上说就是要由全人类从文化层面出发来解决的任务。“东亚奇迹”与“中国的和

平崛起”恰恰为人类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一个较为容易嵌入的对接点。近年来日本一直以“国际化”作为“贸易立国”与“技术立国”的出发点与归宿点，韩国也大力倡导“国际化”。日本《产经新闻》就韩国总统金泳三访华发表的报道指出“韩国正在朝着‘全球’转换思路”。可见东亚的崛起过程中所倡导的放宽“国际视野”与“兼顾双赢”原则的确是从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汲取了丰富的营养。

雅斯贝尔斯指出“人类一直靠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新燃起火焰。”<sup>[5]</sup>正如杜维明而言，要想从理论上了解中国传统儒家传统在东亚封贡体系下，特别是东亚工业社会中，具体运作的实际情况以及所产生的效果。我们必须对儒家传统在今天日本、韩国等地错综复杂的曲折表现有如实的认知，才能争取到儒家伦理和东亚经济发展有否“亲和”(affinity)关系的发言权。随着文明进程的不断推进，中国儒家文化不仅是中国的和东亚的，也应该是世界的精神资源。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应该积极加强“文明对话”，

操作时应效法荀子以“仁心说，学心听，公心辩”的平正胸襟和世界各地的精神传统进行互惠互利的对话、沟通。尽管现在东亚国家所倡导的儒家文化与传统的儒家文化存在很多不同之处，但是其内核都是一致的。因此从理论上而言，研究中国磁头的儒家文化对日韩管理思想的影响，不是为了创造一种普世文化，而是为了应对全球化时代的需要，因此应该从文化本源入手进行具有多样性的战略思考，是为了摆脱大混乱的世界价值观，加强对“原生态文化”保护的理论反思。

从现实角度而言，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东亚经济总体上仍然在持续发展，特别是中国被公认为是世界上最有吸引力的经济大市场之一。但是中国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是否可以避免西方社会在现代化过程中的弊端——公民意识下降、人情冷漠世态炎凉？如何营造企业和“和谐”社会？如何实现终极关怀和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要想解决这些现代化过程中形成的问题，我们必须用开拓性思维，以一种较为开阔的宏观视野来探求这一问题的答案。所以以“扬弃”

的态度研究同处于儒家文化圈的日韩管理思想则是一种较好的现实选择。

## 二、中日韩管理方式的文化基础分析

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宗旨可以归纳为“做人治世”<sup>[6]</sup>，中国传统中的管理思想可概括为“修己”和“安人”，即以自我管理为起点，以社会管理为过程，最终实现“平天下”之目标。所以在儒家文化圈就出现了把家族的管理方法适用于管理企业和国家，形成了以家族管理为出发点的传统管理思想。以传统文化为基础的家族管理思想与西方制度化科学管理理论不同，西方管理强调理性规则、秩序，而儒家传统型管理则是讲人情、讲平均。所以很多人认为包括日韩在内的儒家文化圈的管理理念是权威管理，而不是民主管理，由此出发，进而得出儒家文化不尊重人权。只要我们仔细研究一下日韩的企业、社会管理的现实选择和终极目标，不难发现，上述观点存在很大的局限性。

以企业家族化为例。我国的家族制在秦汉以后乃至整个封建社会中，仍保持着顽强的生命力，并发挥

着重要的社会功能。因此宗族组织成了社会存在的经济和政治的基础，而这正是家族主义倾向的深厚基础。<sup>[7]</sup>同样在日本、韩国的企业管理模式，带有明显的企业家族主义色彩。“集团意识”、“忠诚意识”、“参与意识”、“整体主义”、“仁爱”、“贵和”和“修身”都是企业的家族化积极作用的具体体现。日本公司常常被叫做“会社”。从词源学角度而言“会社”这个词本身的含义就是“大家赖以生存的集团”的意思。而“忠诚心”是“集团意识”的核心，是“忠于天皇，拼死不憾的武士道精神为核心的‘和魂’”在日本企业中的体现。当然企业家族化的变异可能导致企业“近亲繁殖”出现诸如“夫妻床(机床)、父子车、婆媳班、父子兄弟班、姑嫂姐妹组和母女处等近亲繁殖。”<sup>[8]</sup>从企业家族化的研究视角出发我们不难看出东亚管理模式的确属于权威管理模式，但是从词源学角度而言，权威管理模式需要的是“权威”，而不是“威权”，“权威”不是 Power，而是 Authority。

从历史上看，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建立的是一种特殊的君主立宪制政体，即“非典型性”的立宪政体。

这种立宪政体所孕育的政府被称之为“有限政府”(The Limited Government)。《日本政治史》的作者信夫清三郎把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建立的政治形态称之为“伪立宪绝对主义”(Pseudo - Constitutional Absolutism)是十分准确的。他认为在日本，一方面，天皇作为日本国民的最高家长统治着国家，另一方面，日本政体又在形式上遵循着近代立宪主义的进步的各项原则，天皇制把近代立宪主义嫁接到传统的神权的和家长制的观念上了，并以立宪主义来掩护其神政的家长制的本质<sup>[9]</sup>。这种形式上的立宪政体本质上是一种从日本传统封建制直接转变过来的具有现代化导向的权威政体。在日本现代化初期阶段，这种权威政体在集中社会有限的各种资源应付现代化的需要方面，以及在整合政治秩序和应对西方挑战方面，均起到了重要的历史作用<sup>[10]</sup>。

韩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前是日本的殖民地，独立后曾经历过李承晚十二年的军事独裁统治。1961年5月，以朴正熙为首的青年军官通过政变建立了军人政权，正是这一以军事力量为后盾的、形式上